

跨文化视界中的巴赫金丛书 周启超 王加兴 主编

М.М.Бахтин

对话中的巴赫金：
访谈与笔谈

南京大学出版社

跨文化视界中的巴赫金丛书 周启超 王加兴 主编

对话中的巴赫金：访谈与笔谈

М.М. Бахтин в диалоге

王加兴 编选

董 晓 王加兴 周启超 朱 涛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话中的巴赫金：访谈与笔谈 / 王加兴编选.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11

(跨文化视界中的巴赫金丛书 / 周启超, 王加兴主编)

ISBN 978 - 7 - 305 - 13653 - 5

I. ①对… II. ①王… III. ①巴赫金(1895～1975)
—访问记 IV. ①K835. 1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1134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从 书 名 跨文化视界中的巴赫金丛书
丛 书 主 编 周启超 王加兴
书 名 对话中的巴赫金：访谈与笔谈
编 选 王加兴
责 任 编 辑 姚 徽 潘琳宁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24.5 字数 350 千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3653 - 5
定 价 53.8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巴赫金学”与其新世纪的新进展

——写在《跨文化视界中的巴赫金》面世之际

周启超

(一)

“巴赫金学”(Бахтинология, Бахтистика, Бахтиноведение; Bakhtinology, Bakhtinistics, Bakhtin Studies),巴赫金研究也。

学术生产中,对于影响甚大的一代大家或读者甚众的一部经典的研究本身已具有偌大规模,已产生广泛影响,而成为一代代学人悉心勘察的对象,成为不同国度的学界长期瞩目的现象,成为学术再生产的一种平台,才可被冠之以“××学”。在外国文学研究界,莎士比亚研究就被冠之以“莎学”,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就被冠之以“陀学”;在中国文学研究界,“红楼梦研究”就被冠之以“红学”。在外国文论界,巴赫金研究也被冠之以“巴赫金学”。

如果说,“莎学”主人公——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陀学”主人公——俄罗斯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红学”主人公——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红楼梦》,都是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检验的世界文学创作中的经典作家或作品,那么,“巴赫金学”主人公——苏联学者巴赫金,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将近50年对整个世界的人文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持续性影响的一代大家。巴赫金学说的原创性,巴赫金思想的辐射力,巴赫金理论的再生产能量,使得巴赫金理论的“跨文化旅行”确乎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巴赫金理论的“跨文化之旅”,其覆盖面之广,其持续性之长,其可操作性之强,恐怕是当代世界人文学界别的明星难以比肩的;正是巴赫金理论之旅的世界性、丰富性、戏剧性,使得我们可以也应该来考察“跨文化视界中的巴赫金”,来梳理巴赫金学说在不同国度被译介被接受的旅行路径,来勘探巴赫金理论在不同文化圈里被解读被征用的命运轨迹。

“跨文化视界中的巴赫金”，便是自有旨趣、自有规模、自有机制、自有形态的巴赫金研究——“巴赫金学”的一个基本主题。

巴赫金研究之规模在当代世界人文学界是屈指可数的。截止到2000年，被统计到的研究巴赫金的文章与著作数量惊人：用俄文撰写或译成俄文的至少有1465种；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撰写的至少有1160种；截止到2009年，用汉语撰写的研究巴赫金的文章与著作至少也有600种。据不完全统计，2001—2008年间，中国期刊上发表的以巴赫金研究为题的文章有308篇，居于德里达研究（295篇）、福柯研究（274篇）之上。

巴赫金研究作为学术生产自有机制。有一群学人，有几份学刊，有定期的学术年会。

世界上竟有两份专门以巴赫金研究为主题的刊物。

1992年，第一份俄文版的以巴赫金为对象为主题的杂志《对话·狂欢·时空体：研究米·米·巴赫金生平、理论遗产与时代的杂志》（*Диалог. Карнавал. Хронопон. Журнал научных разысканий о биографи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м наследии и эпохе М. М. Бахтина*）在白俄罗斯维捷布斯克国立大学面世；该刊由尼古拉·潘科夫（Николай Паньков）主编，后来移至俄罗斯，在莫斯科出版；该刊每年出4期，一直发行到2003年；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1994年由英国著名巴赫金专家D.谢泼德（David Shepherd）建立的“巴赫金中心”，也于1998年创办了一份英文版的以巴赫金研究为主题的刊物《对话主义：巴赫金研究国际杂志》（*Dialogism,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akhtin Studies*），该刊已出版4卷，发行到2000年。

国际巴赫金学术年会自1983年启动，每隔两三年举行一届（前12届均是每两年开一次；自第13届起，改为每三年开一次），已经自成传统。这个盛会每次有150位左右的国际巴赫金专家们参与其中，每届会期5天。国际巴赫金年会一直在引领巴赫金理论的跨文化之旅，其旅行路经加拿大至意大利，从意大利至以色列，从以色列至南斯拉夫，从南斯拉夫至英国，从英国至墨西哥，从墨西哥至俄罗斯，从俄罗斯又到加拿大，从加拿大到德国，从德国到波兰，从波兰到巴西，从巴西到芬兰，从芬兰到加拿大，从加拿大再到意大利，从意大利到瑞典。巴赫金理论之旅已持续30余年，穿越欧美10多个国家，其覆盖面之大，十分

罕见。这里,加拿大、意大利的人文学界表现尤为突出,多次担当国际巴赫金学术年会东道主,与美国、英国、俄罗斯、中国一起成为国际“巴赫金学”的重镇。

犹如大树的发育生长自有其年轮,“巴赫金学”的生成发展也有几个节点。

1983年,这是巴赫金理论“跨文化之旅”的一个新的起点。这一年,北美、英伦、中国的人文学界几乎不约而同地将视线投向巴赫金这位苏联学者。这一年10月,在加拿大,克莱夫·汤姆逊(Clive Thomson)发起举行第一届巴赫金学术国际研讨会,创办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后来则有斯拉夫语)等多种文字出版的《巴赫金研究通讯》(*Le Bulletin Bakhtine/The Bakhtin Newsletter*),率先以大学学报专辑刊发研究巴赫金的文章(*The University of Ottawa Quarterly*, 1983. Vol. 53. NO1: *The Work of Mikhail Bakhtin*);这一年9月,在中国,巴赫金成为首届“中美双边比较文学研讨会”的一个重要话题,钱中文遵照钱钟书的嘱咐,在这年年初就着手准备并于9月在北京召开的这个研讨会上宣读了题为《“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之一》论文;这一年12月,美国各地、各学科的巴赫金专家首次在《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上举办以巴赫金为专题的研讨会;这一年,在英国,第一部《巴赫金学派论文》英译本(《俄罗斯诗学译丛》第10辑)由安·舒克曼(Ann Shukman)编选,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这一年10月,在德国,主题为“小说与社会:米哈伊尔·巴赫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耶拿举行。这次会议是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由“斯拉夫文化互动国际学会”组织,来自东德、西德、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法国、荷兰、加拿大、苏联诸国高校的学者出席了这次学术研讨会。……如今回溯巴赫金接受史,1983年堪称“国际巴赫金年”。如果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里,巴赫金理论经历“第一次”被发现:她走出苏联,被法国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界所关注,被意大利的符号学界所关注,她的跨文化旅游还只是局部性的。那么,及至20世纪80年代,巴赫金理论经历了“第二次”被发现:她的旅行路径已然进入多线并进的新格局,她已经不再驻足于法兰西与意大利。她越过大西洋,进入北美;她由欧陆潜入英伦;她还向东方进军。这样多方位的旅行,已然几近于环球之旅。巴赫金研究由此而发展成为专门性

很强而又拥有广泛影响，跨语种跨学科跨文化，覆盖面大、辐射力强而富有生产性的一门学问。还在 1986 年，美国著名巴赫金专家 G. S. 莫尔逊(Gary Saul Morson)就曾戏称巴赫金研究已成为“巴赫金产业”(The Baxtin Industry)。“巴赫金热”使得“巴赫金学”成为当代世界人文研究的一门显学。

1995 年，巴赫金理论的跨文化之旅，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进入如火如荼的旺季，在巴赫金百年诞辰(1995)前后进入巅峰状态。与此同时，“巴赫金学”也进入对其自身的成果与问题予以清理总结、对巴赫金研究史接受史予以梳理审视的历史性反思之中。

1995 年 7 月 26 日—30 日，第 7 届国际巴赫金学术年会在莫斯科师范大学举行；50 位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学者，80 位来自英国、德国、丹麦、以色列、加拿大、意大利、墨西哥、新西兰、波兰、美国、土耳其、芬兰、韩国、日本 14 国的外国学者，共聚莫斯科。这届年会设有 19 个分会场：“对话哲学”、“审美活动”、“哲学语境”、“对话与文学”、“文学与狂欢”、“文本问题”、“哲学复兴”、“修辞学与/或对话学”、“长篇小说理论”、“翻译与‘可译性’”、“巴赫金与俄罗斯文化”、“巴赫金与后现代性”、“女性主义视界”、“体裁诗学”、“巴赫金与诗歌”、“与巴赫金一同解读”、“文化的相互联系”、“教育学与心理学”、“社会文化语境中巴赫金的生平”。这届年会上有 123 个发言，这些发言可以概括为三个系列：“巴赫金与某一位哲学家”、“巴赫金与某一位作家”、“巴赫金与某一个问题”。第一个系列中的哲学家名单，从凯尔克戈尔与叔本华一直到福柯与德里达；第二个系列中的作家名单里，则有维吉尔、米尔顿、菲尔丁、果戈里、伍尔芙、纳博科夫、里尔克、普拉东诺夫、奥尼尔、帕斯捷尔纳克、米洛什、康拉德。巴赫金思想辐射的“光谱”十分宽阔。

在莫斯科年会开幕式上作报告的三位学者，分别来自意大利、美国与俄罗斯。美国学者 K. 伽德勒(K. Gardner)、俄罗斯学者 B. 马赫林(Виталий Махлин)；威尼斯大学教授——维托尼奥·斯特拉达(Vittorio Strada)的报告是《“发现”米哈伊尔·巴赫金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在西方斯拉夫学界中最早“发现”巴赫金的这位意大利学者，论述了 20 世纪 60—90 年代的“巴赫金热”及其原因与可能有的学术成果。他认为，在近二三十年里被重新发现的俄罗斯思想家当中，没有一个像巴赫金这样产生那样大的影响；B. 马赫林的报告是《面对面：即将

完结的百年之未完成的历史上的米哈伊尔·巴赫金》;美国学者 K. 伽德勒的报告是《论第三个千年的哲学:抑或东西方之间的米哈伊尔·巴赫金》;这届年会上,莫斯科大学图书馆向与会学者播放了由 B. 杜瓦金采访的巴赫金回忆涅维尔生活的谈话录音,以及巴赫金当年朗诵 A. 费特的一首诗的录音。在这届年会闭幕式上作报告的,有美国著名巴赫金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斯拉夫学者凯瑞尔·爱默森(Caryl Emerson),她的发言涉及当代西方巴赫金研究的两个层面,其一,与狂欢的思想相关联;其二,是对巴赫金的内在之“我”三个模型的接受:对话性的、狂欢性的、构筑性的。她指出,俄罗斯的巴赫金学在 5 年里追赶上 30 年的西方巴赫金学。这要归功于巴赫金著作的出版中心与研究中心的努力:这些中心的领衔人物是 K. 伊苏波夫(彼得堡)、B. 马赫林(莫斯科)、H. 潘科夫(维捷布斯克)和 I. B. 彼什科娃(莫斯科);摩尔多瓦大学也是巴赫金学的一个基地。这位美国学者特别强调在巴赫金研究领域俄罗斯与西方进行对话的巨大意义与教益。英国巴赫金学会会长大卫·谢泼德(David Shepherd)因故未能与会,他的报告被安排在闭幕式上,其题目是《没有对话,没有对话主义:俄罗斯学界接受视野中的西方巴赫金学》。

B. 马赫林在会后的报道里指出,莫斯科年会的特点有三:其一,不同的人文学科与不同的视界之交锋互动;文学学论题十分广泛,但已不再占据主导;占据主导的是一般的人文理论兴趣,其中有迫切的哲学、文化学问题,例如,“巴赫金与后现代性”第二次分组会听众爆满;会上第一次在巴赫金研究中用世俗语言谈论神学或准神学话题。其二,与会学者构成上的新旧更替。这届年会上,很少看到 20 世纪 60 年代甚至 80 年代的巴赫金学首倡者的身影,来自西方的寥寥几个,莫斯科本土的竟一个也没有与会。甚至那些在巴赫金学中出道成名的研究者(主要是文学学家)如今也离去了(抑或“内地离去”)。如今对巴赫金感兴趣的已然是另一波学者。其三,俄罗斯本土的巴赫金学与国外的巴赫金学之间如果说是对话,至少也是在对接上有可观的进步。巴赫金学的这两个方阵之最初的“接触”曾暴露出完全的不对接性:1991 年曼彻斯特巴赫金年会上,一位英国与会者(“后马克思主义者”)谈到其印象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看上去仿佛“至少同时是在开两个会”。首先立刻出现语言壁垒;更折磨人的则是不同世界不同的“话语”之

间——似乎是在对同一个概念进行阐述中的不同“话语”之间的壁垒。马赫林认为，如今世界性的巴赫金学一个众所周知的特点，可以见之于学术争鸣中的不同声音（如果愿意——就是“多声部”与“杂语”）；这不仅从“意识形态”方面来看是有成效的，而且从“专业化”方面来看也有成效。“文学学家”与“哲学家”在巴赫金学中或隐或显的冲突，几乎不可避免；在一些根本性的事情上仅仅“依据专业”的交谈就显得不够了，共同的对象要求有共同的交谈语言。马赫林认为，有别于在西方，“巴赫金与文学学”这一题目，在俄罗斯尚未成为严肃认真的谈论对象。俄罗斯另一位著名巴赫金专家 H. 鲍涅茨卡娅（Наталья Бонецкая）在谈到莫斯科年会印象时认为，作为哲学家的巴赫金，在研究者的心目中似乎彻底占据了作为文学学家的巴赫金的上风，出现了作为神学家的巴赫金之新形象，虽然是很模糊而有争议的。这是曼彻斯特巴赫金年会、墨西哥巴赫金年会都不曾出现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莫斯科年会上，已经有一些学者看出巴赫金学的危机。有人提出，巴赫金之异常流行，在其自身隐藏着危险：巴赫金这一个对话性真理的代言人，曾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但也会成为一个实质上的独白主义者。应当记住巴赫金本人说的这句话，“他大于自己的命运且高于自己的时代”。有专家坦言巴赫金学的困惑：感觉出视界、主题、论域均已枯竭；巴赫金学能否克服这一危机，找到新的路向？有学者提出，巴赫金以其社会责任性原则展现为一个很好的节制者。“参与而应分”的自由哲学，理应来取代无边无界的、无应分而不去分担的自由哲学。那样，我们就能重构巴赫金思想的全部厚度与深度。而目前，在现如今的危机状态，整个巴赫金学——不论是本土的，抑或是外国的——都深陷其中的这个状态，让人有必要在方法论意义上系统地克制使用由巴赫金所引入，已成为畅销的概念——对话，狂欢，时空一体……

1995 年 7 月，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巴赫金中心”，举行了主题为“巴赫金：一个世纪的反思”的学术研讨会。

1995 年 11 月，在中国，北京的巴赫金学者在纪念巴赫金百年诞辰的研讨会上，在对巴赫金研究中的问题进行反思时形成了一个共识：巴赫金研究要深入下去，就要以对巴赫金文本的系统掌握为前提为基础；要组织力量编选翻译出版巴赫金文集。

1996年,在俄罗斯,在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理论部巴赫金研究群体在纪念巴赫金百周年诞辰之后,很快就推出巴赫金文集第一卷。

1997年,在英国,《面对面:巴赫金在俄罗斯与在西方》(*Face to Face: Bakhtin in Russia and the West*, Sheffield University Press.)由曼彻斯特大学“巴赫金中心”推出;同年,在美国,C. 爱默森(Caryl Emerson)的专著《巴赫金的第一个百年》(*The First Hundred Years of Mikhail Bakhti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在普林斯顿大学面世。两年后,英语世界里第一部《巴赫金研究文选》(Emorson, C. ed. *Critical Essays on Mikhail Bakhtin*, New York: G. K. Hall. 1999, 418p.)作为“世界文学研究丛书”的一种,也在纽约与读者见面了。C. 爱默森为这部文选写了一篇导言,其题目引人入胜:“巴赫金是谁?”(WHO IS BAKHTIN?)巴赫金其实具有多面性与悖论性,无法将他纳入任何一个被严格界定的系统,无论是结构主义、符号学,还是解构论。巴赫金是一个文学学家、语言学家、语文学家,还是一个哲学家、美学家?抑或是一个以文学研究者的角色出场的哲学人类学家?对巴赫金学术身份的定位可谓众说纷纭,至今仍是巴赫金学面对的热点话题。

红红火火的“巴赫金学”,堪称20世纪下半叶当代世界人文学界的一道亮丽风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著名符号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学与人类学学者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观察到,及至20世纪末,巴赫金已成为世界上被阅读最多、被征引最多的一位人文学家。当代国际人文学界的风云人物,诸如,法国的克里斯特瓦、托多罗夫、巴尔特,德国的尧斯,意大利的埃科,英国的威廉姆斯、伊格尔顿,美国的德·曼、布斯,更不用说苏联的洛特曼、利哈乔夫、阿韦林采夫等名家,均发表过谈论巴赫金的文章,都曾与巴赫金进行对话与潜对话。当代国际人文学界如此红火的“巴赫金热”,使得《巴赫金通讯》(*Le Bulletin Bakhtine / The Bakhtin Newsletter*, 5)能够及时地推出主题为“环球巴赫金”(*Bakhtin around the World*)特辑,收入其中的文章有:《意大利人所阅读到的巴赫金》、《在法国与在魁北克的巴赫金》、《以色列的巴赫金研究》、《波兰对巴赫金的接受》、《德国学术界视野中的巴赫金》、《西班牙对巴赫金的评论》、《日本对巴赫金的接受》、《与另样的世界沟通之际——俄罗斯与西方最新的巴赫金研究在狂欢观上的对立》。而在此

之前，1995年，克雷格·布兰迪斯特(Craig Brandst)已发表《英国巴赫金学概览》一文。巴赫金理论在其覆盖面甚大、辐射力甚强的跨文化旅行中，已成为当代国际人文学界话语实践与学术生产的一个“震源”。

(二)

进入21世纪之后，“巴赫金学”的境况怎样？新世纪以降这15年，“巴赫金学”有什么新的气象？或者，经历了持续几十年的开采，巴赫金这一理论矿藏是不是已经几近枯竭？“巴赫金学”在达到其波峰之后有没有跌入波谷？这是巴赫金研究者要自然面对和反思的一个问题。2002年3月1日—2日，在美国，在耶鲁大学举行的斯拉夫文论研讨会上，在主题为“巴赫金：赞成与反对”(Bakhtin: Pro and Contre)的分会场，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凯瑞尔·爱默森的报告是：“走红之后的巴赫金：某些曾经有争议的要素与它们会引向何方？”(*Bakhtin after the Boom: Some Contested Moments and Where They Might Lead?*)，来自谢菲尔德大学的大卫·谢泼德教授的报告也是：“巴赫金在/与危机：长远时间的问题”(*Bakhtin in/and Crisis: Problem of Great Time*)这两个报告出自美英学界多年潜心于“巴赫金学”的学者之手，体现出美英巴赫金研究者对“巴赫金学”中的问题进入自觉的反思阶段。2003，在俄罗斯，《巴赫金术语辞典》以俄罗斯人文大学的期刊《话语》专辑(2003/11)面世；该辑以C.H.布罗伊特曼的文章《巴赫金的学术语言与术语：某些总结》开篇。第1部分为“巴赫金的学术概念之系统性描述辞典材料”；第2部分为“美学史与语言哲学史上的巴赫金”。这里对巴赫金“学术概念”的系统性描述，是1997年问世的《巴赫金术语辞典·材料与研究》的续篇。俄罗斯人文大学的巴赫金研究群体，在“巴赫金学”达到波峰状态之际就已开始自觉地反思“巴赫金学”的两种危险：其一，有些谈论巴赫金的文章与著作的作者其实不过是以巴赫金为“话由”而在进行自我表现，那些自我表现与巴赫金本人的思想几乎是毫无关系；其二，一些巴赫金研究者只是做了巴赫金思想的“主人公”，并不能够占据“外在于它且有理据而能应答的”立场。《巴赫金术语辞典》，是俄罗斯人文大学巴赫金研究群体持续10年的项目成果。1993年2月1日—3日，在该校举行的“巴赫金与人文科学的前景”学术研讨会上曾讨论过

这个项目,讨论了“词汇表”。

人文大学的“巴赫金学”成果表明,上世纪启动的巴赫金研究在新世纪还在延续。新世纪以降的俄罗斯“巴赫金学”,至少有 10 部著作值得关注。

2003 年,《对话·狂欢·时空体》发行最后一期(第 39/40 期)——专辑《世界文化语境中的巴赫金》;之后,该刊主编尼古拉·潘科夫潜心于专著写作。2010 年,推出其巴赫金研究总结性著作《巴赫金的生平与学术创作中的问题》。该书聚焦于 20 世纪 30 年代末、40 年代初巴赫金的学术生涯,梳理巴赫金论拉伯雷一书的写作史,披露当年巴赫金以这部著作进行学位答辩的过程,苏联学术界知名学者当时对巴赫金的不同评价,以及 20 世纪 60 年代里巴赫金的几位“发现者”与巴赫金本人的通信。

2011 年面世的《巴赫金的〈话语创作美学〉与俄罗斯哲学—语文学传统》,是著名巴赫金专家纳丹·塔马尔钦科在巴赫金学园地耕耘多年的收官之作。作者的观点是:要揭示出巴赫金所写下的文本之原初的含义,学者本人置于其思想之中的那份理解,只有在这一条件下才有可能:将巴赫金的那些思想作为诗学概念的体系——这些概念形成了一种独一无二却至今尚未得到充分评价的文学理论——来研究。作者驻足于巴赫金的思想与其本土的、欧洲的美学之历史经验的关联性,这些思想与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和他之前的哲学在语境上的内接性,以及它们对这一语境之改造性的梳理。巴赫金的学说,作为他那个年代那些标志性的美学理论与文化学理论之强劲的“契合应和的对话”而得以揭示。在这本书里得到呈现的对话的主要参与者——巴赫金与弗洛连斯基,巴赫金与别雷,巴赫金、E. 特鲁别茨科伊与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巴赫金与罗赞诺夫,巴赫金与布捷波尼亞,巴赫金、梅列日科夫斯基与维亚切·伊凡诺夫,巴赫金与斯卡夫迪莫夫,巴赫金与 A. 维谢洛夫斯基;国外的人物是黑格尔、康德、洪堡、尼采、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施宾格勒、卢卡契。这些学者的哲学理论,在这里被置于它们与巴赫金着重于长篇小说形成过程之诗学概念体系相互作用的层面而得到分析。H. 塔马尔钦科这一整串的对比性研究,开采出巴赫金在长篇小说体裁领域的那些发现的多维度性与深度。特别有趣而有意义的是,书中讨论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与文化学的章节,白银时代的长篇小说理

论乃是巴赫金的长篇小说学说的先声。

2009 年,伊琳娜·波波娃(И. Л. Попова)的专著《巴赫金论弗朗索瓦·拉伯雷一书与其对于文学理论的意义》由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出版;

2007 年,亚历山大·卡雷金(А. И. Калыгин)的专著《早期巴赫金:作为伦理学之超越的美学》由俄罗斯人文学会出版;

2005 年,弗拉基米尔·阿尔帕托夫(В. М. Алпатов)的专著《沃罗希诺夫、巴赫金与语言学》由斯拉夫文化语言出版社发行;

2013 年 8 月,笔者在莫斯科出席“俄罗斯形式论学派 100 年国际研讨会”之际,在书店里看到这年刚出的一本新书:《米·米·巴赫金与“巴赫金小组”现象:寻找逝去的时光·重构与解构·圆之方》。该书的主题是对巴赫金与其最为亲近的朋友——B. H. 沃罗希诺夫与 П. Н. 梅德维捷夫(他们之间的友情合作如今已被称之为“巴赫金小组”)——的生平与创作中那些很少受到研究、有些部分已然成为难解之谜的问题,加以清理辨析。该书作者 Н. Л. 瓦西里耶夫生活于巴赫金曾在那工作多年的萨兰斯克,且就在巴赫金曾在那里多年主持俄罗斯文学与外国文学教研室的国立摩尔多瓦大学执教。该书是作者几十年(1985—2012)来的巴赫金研究成果之汇集。作者对“巴赫金的语言学思想”、“作为文化史现象的巴赫金主义”、“苏联(俄罗斯)的巴赫金学现象”进行了阐述,对“有争议的文本”之著作权问题与版本问题,对 B. H. 沃罗希诺夫的生平、B. H. 沃罗希诺夫与米·米·巴赫金的关系、同时代人对 B. H. 沃罗希诺夫的评价进行了考证,尤其是提供了中学教师巴赫金、大学教师巴赫金、巴赫金与其研究生、巴赫金的“萨兰斯克文本”等珍贵史料的描述。

俄文版的这些研究巴赫金的论文与专著之不断面世,是国际巴赫金学在新世纪不断推进的一个缩影。其他文字如英文版、中文版的研究巴赫金的论文与专著,新世纪以来也在不时地与读者见面。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列举。通过对新世纪以来国际“巴赫金学”重要成果的跟踪与检阅,我们看到的是:巴赫金理论作为学术时尚其风光已然不再,巴赫金理论的跨文化之旅已进入常态。

这种常态,体现为“巴赫金学”的学术交流一如既往。国际巴赫金学术年会以其已自成传统的节奏,定期举行。新世纪以来,不同国度的

巴赫金研究者先后相聚于波兰(2001)、巴西(2003)、芬兰(2005)、加拿大(2008)、意大利(2011)、瑞典(2014),6届国际巴赫金学术年会成为新世纪巴赫金理论之旅的驿站;由这一盛会所引领的巴赫金理论的跨文化之旅,在继续播撒其辐射力,在不断拓展其覆盖面。

这种常态,体现为“巴赫金学”的文本建设不断拓展。新世纪以来,巴赫金著作之多个语种的译文以单行本、文集甚至全集的形式在不断面世。2009年,中国著名巴赫金专家钱中文主编的中文版《巴赫金全集》7卷本面世,这是对1998年出版的中文版6卷本《巴赫金文集》的增订;2013年,意大利著名巴赫金专家奥古斯都·蓬佐主编的意俄双语版《巴赫金文集(1919—1929)》问世;2012年,由俄罗斯著名巴赫金专家谢尔盖·鲍恰罗夫担纲的俄罗斯科学院版《巴赫金文集》(6卷7册)这一“巴赫金学”基本建设工程终于竣工。这一工程始于纪念巴赫金百年诞辰的1995年;第一卷出版于1996年,整个文集的编辑出版持续了整整16年!以俄罗斯科学院的巴赫金专家为主体的这个巴赫金研究集群,以其十分严谨而执着的治学精神,投入了巴赫金理论遗产之精细的注疏、深度的开采。

这种常态,体现为“巴赫金学”的文献整理进入收获季节。随着巴赫金学的发展,对“巴赫金学”成果的检阅、清理、审视、集成,作为巴赫金研究之研究,自然也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新世纪伊始,俄文版2卷本《巴赫金研究文选》在彼得堡问世;2010年,俄文版1卷本《巴赫金研究文选》也在莫斯科发行了。2003年,英文版4卷本《巴赫金研究文选》与英语世界的读者见面了。经过长达5年的编选、翻译、编辑,中文版5卷本《跨文化视界的巴赫金》,也于2014年金秋时节呈现在汉语世界的读者面前。

由此,我们至少可以从这3条路径看“巴赫金学”在新世纪这15年来的新进展:可从近6届“巴赫金年会”看新世纪以来国际学界对巴赫金理论的解读与征用;可从俄文版6卷本《巴赫金文集》看新世纪以来国际学界对巴赫金文本的开采与注疏;可从俄文版、英文版、中文版3种《巴赫金研究文选》看新世纪以来国际学界对“巴赫金学”成果的梳理与集成。

(三)

从“巴赫金年会”看新世纪以来，国际学界对巴赫金理论的解读与征用

新世纪第一届国际巴赫金年会(波兰，格丹斯克大学，2001年7月23日—27日)。会后，波兰著名巴赫金专家鲍古斯拉夫·祖尔科(Boguslaw Zylko)教授编选了这届年会论文选《巴赫金与其学术氛围》(2002)。书中收入22篇论文，以这届年会上几个分组会的主题分成8个单元：第1单元“巴赫金的变体”收入《巴赫金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文本问题》、《形象中的时空体》；第2单元“长远语境与当下语境中的巴赫金”收入《“长远时间”观照下巴赫金对话主义的一些根源》、《米沙与柯利亚：思考的兄弟/他者》；第3单元“巴赫金与文化研究”收入《巴赫金与小说诗学：一种批评的融合》、《巴赫金的“受话性”与早期现代主体的形成》；第4单元“巴赫金语言学的哲学来源”收入《巴赫金对话与言谈理论的哲学根源》、《符号、言谈与话语：寻找新的方法论的种种可能》、《沃罗希洛夫与卡西尔：论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第5单元“巴赫金与文学批评”收入《巴赫金理论视域的文学原型问题》和《尼采、维亚切·伊凡诺夫与巴赫金的“小说与悲剧”问题》；第6单元“巴赫金哲学人类学的伦理与美学”收入《对话与文学作品：它们在巴赫金话语创作美学中的相互关系》、《跨文化，跨种族：巴赫金与“文学地看”的独特性》、《作为伦理学范畴的复调》。

新世纪第二届国际巴赫金年会(巴西—库里蒂巴，2003年7月21日—25日)，来自19个国家的184位学者与会，工作语言为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英语、俄语；加拿大著名巴赫金专家克莱夫·汤姆逊在年会上作了《巴赫金国际学术研讨会20年》报告；巴西年会的一个亮点是语言学。会上重要的报告有：《巴赫金与本维尼斯特》、《巴赫金、马尔主义与文化革命的社会语言学》、《圣礼的与日常的：巴赫金、本雅明、布伯与维特根什坦对语言的关注》、《巴赫金与梅洛-庞蒂的语言现象学》、《巴赫金与索绪尔——超越对立》。专门讨论巴赫金著作的文学学与哲学层面的论文较少，与会学者的发言中最为流行的术语是对话与对话主义。

新世纪第三届国际巴赫金年会(芬兰—韦斯屈莱大学,2005年7月18日—22日),来自20个国家的90多位学者与会,工作语言为英语、俄语。与会的俄罗斯学者人数仅次于英国、美国。俄罗斯巴赫金学的主将鲍恰罗夫、马赫林、尼古拉耶夫、瓦西里耶夫、波波娃等11位与会。会间,举行了题为“巴赫金学的未来”的圆桌会议。芬兰年会的亮点是当代国际巴赫金学的大腕几乎全都与会。谢·鲍恰罗夫的大会报告《作为语文学家的巴赫金: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提出,“文学学领域里这么多的成就与其大名相关联的这位学者,就其方法论而言首先是一位哲学家”。弗·扎哈罗夫的报告是《巴赫金“学派”中的体裁问题》,对“фабула”、“сюжет”、“жанр”这几个术语的使用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巴赫金并不是在严格的文学学意义上使用这些术语,他更像是一位哲学家,而不是一位职业语文学家。加拿大学者肯赫施考普(Ken Hirschkopf)的报告是《巴赫金、索绪尔与苏联语言学:我们怎样理解“语言社会学”?》,美国学者彼得·希区考克(Peter Hitchcock)的报告是《理论之后的巴赫金》,俄罗斯学者叶萨乌洛夫的报告是《作品艺术整体中作者的“位置”与读者的立场》,芬兰学者米·德·米基耶尔(M. Демикиель)的报告是《论巴赫金与翻译哲学》。

新世纪第四届国际巴赫金年会(加拿大—伦敦城,2008年7月28日—8月1日),来自23个国家的100多位学者与会;这届年会的主题是讨论“巴赫金小组”的学术探索。工作语言为英语、俄语、法语。俄罗斯学者H.瓦西里耶夫在会上的报告是《“巴赫金小组”集体创作语境中П.梅德维捷夫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一书的语言学内容》,英国学者大卫·谢泼德在会上宣读了Ю.П.梅德维捷夫与Д.А.梅德维捷娃合写的论文,该文探讨了“巴赫金小组”的遗产,尤其是П.梅德维捷夫的学术探索。

新世纪第五届国际巴赫金年会(意大利—贝尔蒂诺罗城,博洛尼亚大学,2011年7月4日—8日),来自23个国家的100多位学者与会。时任罗马大学客座教授的美国著名巴赫金学者凯特琳娜·克拉克(Katarina Clark)出席了这届年会。与会学者中,数量上仅次于东道主意大利学者的是巴西学者,有20多位;这届年会议的一个特色是同声翻译全覆盖,同时用三种语言(俄语、意大利语、英语),大会发言45分钟,分组发言30分钟。有足够的时间提供给听众提问与有效的讨论。

会上报告中，研究巴赫金理论本身的话题相对较少，主要有《巴赫金小组：对这一现象的论证》、《尼古拉·巴赫金与米哈伊尔·巴赫金：协和与对位：哲学立场之比较分析》、《巴赫金论弗朗索瓦·拉伯雷一书：透过文本史的棱镜来看思想与概念的起源》、《巴赫金超语言学之源头》、《巴赫金笔下之自己的话语与他人的的话语》等；会上更多的是一些“泛巴赫金”层面的报告，且带有哲学的或文化学的偏向。不少发言者对先前的“巴赫金学”建树不甚了了，甚至不了解某一论题的基本文献，不了解巴赫金生平的重要细节。巴赫金的大名在不少学者心目中，沦为可以就任何论题而进行自我表达的“话由”。

新世纪第六届国际巴赫金年会（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家艺术学院，2014年7月23日—27日）。这届年会的主题是“作为实践的巴赫金：学术生产、艺术实践、政治激进主义”。来自不同国度的150多位学者与会。会议安排的主旨发言，有美国学者凯瑞尔·爱默森的《巴赫金与演员：主要以莎士比亚为例》，意大利学者奥古斯都·蓬佐（Augusto Ponzo）的《巴赫金论科学、艺术、政治与实践》，英国学者加林·吉哈诺夫（Galin Tihanov）的《“世界文学”历险记：巴赫金与俄罗斯形式主义回顾》。未能与会的俄罗斯学者谢尔盖·鲍恰罗夫为本届年会准备的特别演讲《哲学家巴赫金与语言学家巴赫金》，由其女玛丽亚·谢尔盖耶夫娜·卡西扬在会上做了专场宣读。会上设立的“圆桌讨论”，有“俄文版6卷本巴赫金文集”（加拿大学者肯·赫施考普主持、英国学者加林·吉哈诺夫与俄罗斯学者伊琳娜·波波娃参与讨论）、“对话的自由”、“立场之异同：对人文学科不同领域里的现象进行对话性理解的可能性及视角”（加林·吉哈诺夫主持），“巴赫金小组与尤里·帕甫洛维奇·梅德维捷夫”（英国学者克莱格·布兰迪斯特主持；加拿大学者肯·赫施考普、克莱夫·汤姆逊，英国学者加林·吉哈诺夫，俄罗斯学者尼古拉·瓦西里耶夫参与讨论）。参加圆桌讨论的学者一半来自不同学科。以吉哈诺夫主持的圆桌会议为例，参加的学者来自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设计等多个领域。

这届年会，共收到各类学术论文150余篇，均安排在专题分会上进行发言和交流讨论。为此，大会安排了48场专题分会。专题分会的组织基本以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所涉及主题为依据，主题内容相同、相近的列为一组。专题分会规模大小不等，有的仅有两位发言人，而规模较